

x

先秦两汉时期福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吴小平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距今 5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 福建原始农业始出现; 在距今 3000 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刀耕火种型的农业经济始占主导地位, 西汉早期仅在靠近内地的闽北和政治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才发展为锄耕和犁耕农业。福建的农业经济长时期落后于周边地区, 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存在密切关系, 六朝时期随着北方汉人的迁入, 封闭的地理单元被打破, 当地的农业经济形态才逐渐缩小与内地的差距。

关键词 先秦两汉; 福建; 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2;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459(2004)01- 0034- 06

Research on the Fujian. s Agriculture Economy during the Pre- Qin and Han Dynasty

WU Xiaop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Abstract: Primitive agriculture of Fujian emerged around 5000B. P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did the - slash and burn. farming method became dominant. The hoeing and ploughing method existed in the north of Fujian and its political centre_ downstream of Minjia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solated loc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lagged behi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It was in the Six Dynasty that Fujian narrowed the gap, thanks to the migration of the northern Han people into Fujian.

Key words: Fujian; agriculture economy; pre- Qin and Han dynasty

由于相关的历史文献十分匮乏, 对福建先秦两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唯有赖于地下的考古资料。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 考古工作者基本建立了福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框架,^[1] 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其农业经济状况提供了保证。鉴于目前尚无有关福建此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专题研究, 本文拟就此问题试做探讨。按照福建早期农业发展的规律, 初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原始农业出现和逐渐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期是福建原始农业出现并逐渐发展的重要阶段。新石器早期由于温和的生态环境, 人们主要以捕捞贝类为生产方式, 原始农业并未产生。新石器中期, 在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中均发现原始农业的痕迹, 但原始农业处于辅助的生产地位。新石器晚期, 由于生态环境和人口的改变, 原始农业逐渐发展, 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由于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经济形态差异十分大, 下面按此两类进行详细探讨。

X [收稿日期] 2002- 10- 16

[作者简介] 吴小平(1974) , 男,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讲师, 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生, 主要从事史前环境考古、汉唐考古的教学和研究。

(一) 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的农业

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和闽南沿海一带,其居民的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贝类,属于典型的捕捞生产形态。由于气候等生态环境改变、人口增多等原因,贝类资源逐渐枯竭,遗址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

11 新石器早期

属于此时期的贝丘遗址有平潭壳蛭头、闽侯溪头、昙石山下层、金门富国墩、诏安腊洲山等,其年代为距今 6000~5000 年左右。人们的经济生产主要依赖于渔猎和采集,农业并未出现,主要表现在:贝壳是主要的文化层堆积且堆积广泛深厚。如腊洲山遗址第二层全部由贝壳堆积而成,堆积厚度达 60~175 厘米,贝类有蚌、蚬、蛤蜊、海螺等 22 种。^[2]壳蛭头遗址第五层主要为贝壳堆积,少见灰土。^[3]富国墩遗址也同样,贝壳堆积广泛分布。^[4]它们不是自然堆积,而是当时人们食后废弃所形成的。在壳蛭头、富国墩等遗址中还可见到隆头鱼、海龟、须鲸等鱼类和水鹿、梅花鹿、赤鹿、野猪等野生动物骨骼。遗址中未见到任何与农业有关的遗存或遗物。这些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主要来源于捕捞和狩猎。

生产工具的构成也可反映上述情况。遗址中所发现的生产工具均为渔猎工具,没有农业生产工具。如长不足 3 厘米、厚 2 厘米的小石锛是主要器类,还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及箭镞、网坠等,未见大型的磨制生产工具。砍砸器和刮削器多为采集挖掘所用,小石锛则用为对动物的切割,这些石器显然不能适应农业生产。

由于缺乏稳定的农业经济,以之为基础的聚落形态和陶器制作便相当原始落后。遗址所见陶器火候低、制作和器类简单,多夹砂粗陶和圜底器。遗址的面积也小,约为 3000 平方米左右,均未发现明确的房屋遗迹,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几乎无随葬品。这些特征反映了新石器早期福建生产力低下、原始农业尚未出现的状况。

21 新石器中期

属于此时期的贝丘遗址有昙石山中层、大帽山、溪头和庄边山遗址,其年代为距今 5000~4000 年左右,文化堆积特征与早期相同,多为贝壳。但是,与新石器早期不同的是,中期遗址的生产工具、手工业及聚落形态均有明显的进步,反映了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如: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通体磨光,有长方形石锛、有段石锛、凹刃石镰、长方形石刀、石铲、石斧等,这些石器为刀耕火种农业耕作和收割的代表性工具,证明了贝丘居民已进行了原始农业的生产。此外,在昙石山、溪头下层还发现家猪骨骼,说明了对动物的利用处在从早期的捕猎发展为饲养的阶段。

由于农业和家畜经营性生产经济的出现,使得陶器手工业独立成为可能。中期陶器火候很高,普遍采用轮制,纹样规范,还发现不少几何纹样,其器形也相对复杂,有釜、罐、豆、杯等器形,这些皆非早期阶段可比拟的。

但是,由于此时期的贝丘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石箭镞、石球、骨镞和陶网坠等渔猎工具,野生动物残骸十分丰富,有虎、象、鹿、牛、猴、熊等,结合出土的大量贝类来看,说明中期贝丘遗址的居民是过着以渔猎和捕捞为主、农业和家畜为辅的经济生活,农业生产所占比例十分有限。

31 新石器晚期

属于此时期的贝丘遗址有福州浮村、霞浦黄瓜山、闽侯昙石山上层、龙海万宝山、惠安蚁山等,年代在距今 4300~3000 年左右,遗址的性质同样表明其经济为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形态,但是文化内涵表明此时的农业生产较以前发达,如黄瓜山干栏式建筑的出现,大量的硬陶器形及各种纹样所体现的陶器制作和大量的有段石锛均可反映。

与农业逐渐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此时期贝类等海产品的捕捞逐渐衰弱。贝类种类从早期的 20 多种变为现在的蚬和牡蛎等几种,贝壳文化层由早期的广泛分布变为现在的局部分布,其厚度从早期的数米变为现在的几厘米,这些变化折射出新石器晚期贝类资源的枯竭,捕捞经济所占比例下降。

(二) 新石器时期山坡遗址的农业

山坡遗址以浦城牛鼻山^[5]为代表,同类遗存还有福清东张、石排下等,其年代在距今5000~3000年左右。这些遗址多分布在内地的河流台地边缘,由于生态环境与贝丘遗址有很大差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很不同,其文化内涵便可反映。如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所占比例比贝丘遗址大,且制作精美,有长方形石铤、钻孔石斧、石钺、石刀和石磨盘等,而渔猎工具较后者少¹,反映了山坡遗址居民以采集植物和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其农业生产较贝丘遗址发达。

陶器也可反映山坡遗址与贝丘遗址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差异。如牛鼻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便较县石山的先进和丰富,器型有圆柱足罐形鼎、袋足规、弧腹圈足或圜底壶、圈足豆、簋、钵等,还出现了许多磨光黑皮陶。在缺乏贝类等海产品的环境下,没有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基础,陶器的制作不可能取得上述进步的。

山坡遗址聚落内涵也可反映其农业的发展程度,遗址面积大,一般在2万平方米左右,遗址中发现了多处聚落遗迹,居住建筑也较先进,东张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叠筑的长方形墙基,地表为草拌泥黄泥抹面并烧烤;黄土仓的房屋残痕也反映了草拌泥黄泥抹面烧烤的地面建筑形态。^[6]这些定居性的聚落出现,没有稳定的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基础是无法实现的。另外,在东张遗址的烧土中还发现了稻草痕迹,南安狮子山的草泥烧土中也发现了稻草壳的痕迹,反映了山坡遗址居民已经种植稻谷类粮食的历史现实,农业在其经济生产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原始农业主导地位确立

两周时期,福建进入青铜时代,此时期由于贝丘遗址的逐渐消亡,捕捞、渔猎经济地位下降为辅助产业,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但由于封闭的地理单元,其农业生产并不发达,停留为落后的原始的刀耕火种型的农业生产形态。

福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闽江流域的铁山类型和东南沿海的浮滨类型。

(一) 铁山类型的农业

属于此类型的遗址有福清东张上层、政和铁山、光泽油家垄、闽清后门寨等,^[7-10]文化内涵较前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有迹象表明此阶段农业生产开始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

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石铤、石刀、石镰外,台阶式分段的高级有段石铤业已普遍使用,甚至出现了铜铤、铜斧和铜刀,说明农业生产较上期有较大的进步。遗址方面,在闽江流域,早期大量的贝丘遗址不复存在,说明当时人们已完成在近海捕捞到山地种植和采猎的生产转变,贝类捕捞已成为辅助产业。另外,高级的墓葬形制、青铜武器如剑、矛、戈和礼器铙的出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也远较早期复杂,绝非采集渔猎经济所能支撑。而陶器方面,器型更加复杂,制作工艺更加先进,出现烧造火候更高的灰硬陶和原始瓷,器型有瓮、罐、钵、碗、豆等,发达的陶器手工业也需要稳定的农业经济为基础,这些均表明了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但是,由于缺乏如铜犁、锄、锛、耒、耜等先进的青铜农业生产工具,也未发现锄、犁类的石器,并且出土的铜斧、铤等数量也相当有限,说明此时期的农业生产并不发达,停留为落后的原始的刀耕火种型的农业生产形态。

¹ 牛鼻山遗址出土的石器情况:铤25件、斧3件、戈2件、钺36件、钺2件,属于狩猎工具的有10件长仅215厘米的小石铤、钺、戈,共48件,其余均属于农业生产工具,有20件,未发现捕鱼工具,农业生产工具与狩猎生产工具比例约为2B5。东张遗址中层出土的石器情况大致与牛鼻山相同。而庄边山遗址则不同,石铤52件,其中27件长度在3厘米左右,钺8件,陶网9件,用牡蛎壳制成的骨凿、刀53件,骨钺2件,其农业生产工具与渔猎工具比例为约1B4

(二) 浮滨类型的农业

此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闽南沿海,如云霄墓林山、平和西山、漳浦香山、南靖浮山等,材料表明闽南地区的经济生产是农、渔并重的复合性经济形态。如墓林山遗址仍发现大量的贝壳堆积文化层,贝壳堆积厚度达30~40厘米,贝壳种类有20多种;^[11]南安大盈寨山遗址的贝壳堆积也有70厘米的厚度,^[12-13]这种贝壳堆积在其他遗址中都可看到,充分说明了捕捞在当时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石器组合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各遗址中,反映渔猎性质的小型石镞和石箭镞是石器的主要器类,甚至在墓林山还使用了相当多的打制石器。但是,铜镞、铜斧的出现,铜戈、铜矛等许多青铜、玉器的出土,说明了其农业发展水平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南安石窟山出土的12件按大小依次排列埋葬的石镞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墓葬中随葬品的贫富分化和青铜剑、戈、矛等武器的出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样说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

三、先进的铁器锄耕和犁耕农业的出现

秦汉时期,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福建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被打破,在靠近内地的闽北地区发现大量的铁器生产工具,表明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传入当地,大大促进了其农业生产水平,福建在秦汉时期已经进入了先进的铁器锄耕和犁耕农业阶段。福建的考古学文化西汉时期为富林岗类型,东汉前后发展为凤林山类型。

(一) 富林岗类型的农业

富林岗类型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福建全省,但主要集中在闽北。重要的有崇安城村古城、福州屏山、新店古城,其中以闽北崇安城村古城发掘时间最长,资料最丰富,对富林岗类型文化农业经济形态的分析,主要依赖古城的资料。

铁器是衡量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重要标尺。在崇安城村古城,^[14]便出土了大量的铁器标本,数量有数百件之多,器形有锛、锄、犁、耙、镬、镰、斧、凿、锤、锯、钉、小铲、拔铲、钩、削、镞、矛、剑、刀、钺、匕首、三角架、釜、门环等。这些铁器表明,随着汉文化的输入,闽地已进入了早期铁器文化阶段,并在农业、手工业、军事、建筑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广泛应用,成为闽越国时期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主要基础。

铁器的使用首先带动的是闽越国的农业经济,当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使用了与汉内地毫无差别的铁农具,如翻地的铁锛、耕地锄草用的铁锄、下种用的铁镬、收割用的铁镰等。甚至有些农具还优于内地,如耙,目前汉代内地仅见两齿和三齿,而闽北则发现了五齿,在农田的精耕细作方面,五齿耙要优于两齿或三齿的。还有出土的铁犁,其重量达15公斤,是全国所发现的汉代铁犁中最重、最大的一件,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由数牛牵挽的开沟犁。^[15-16]这些说明,汉初闽中的农业生产水平已基本赶上内地,进入了发达的锄耕和犁耕农业阶段。正因闽越国的农业生产接近内地的发展水平,有了较强的物质基础为保障,闽越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内涵才发生了巨大变化,如聚落方面,大型的聚落和城址出现。如崇安汉城,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面积为48万平方米,现存城墙约4米,有城门、护城河和殿堂坛庙等礼制建筑,并出土了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万岁瓦当等建筑材料。在浦城、邵武、福州等地也陆续发现了闽越国时期的官署和别宫建筑。陶器方面,制作更加精美复杂,纹饰丰富,有方格纹、绳纹、菱形纹、回纹、网格纹、圆圈纹、旋纹、水波纹、锯齿纹、镂空纹和附加堆纹等,主要器物有瓮、罐、盆、盘、釜、盒、钵、盅、杯、壶、匏壶、提筒、香熏、鼎、甑等。

发达的农业生产经济使得闽越国力增强,人口增多。据研究,^[17(P190)]闽越国人口大致在16万左右,其中军队有4万,没有发达的锄耕和犁耕农业经济为基础是不可能维系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民众。史载/今闽越王, , 又数举兵侵袭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 , 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18(卷64)]也反映了闽越国力的强盛。

(二) 凤林山类型的农业

属于东汉前后凤林山类型的考古遗存目前仅见墓葬,分布在光泽凤林山、福州洪塘和闽侯荆溪山三处,这与闽越国除后初期闽中部分越人内迁江淮、部分逃亡山里未出,闽中地广人稀的局面有关,有史实为证。5史记#东越列传6载/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⁰。即使如此,通过发现的器物也可看出当时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目前所见器物有:陶罐、瓮、壶、灶、仓、耳杯、铁壶、铁釜、熏炉和/五铢⁰/货泉⁰、铁剑、铜镜等。陶仓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粮食已有剩余并储存,耳杯一般为酒器,其出现同样说明粮食的剩余。汉代钱币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的物品生产经过交换成为商品的事实。这些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农业的生产情况。墓葬中随葬铁器,从侧面反映了铁器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铁器必定继续用于农业生产,此时遗存中未见一件石器也可反映。但是,由于当时福建不为汉政府重视,人口又稀少,自然无法进行土地的大规模开垦和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力必然低下,而这种状况要到魏晋时期随着北方汉人的大量进入才得以改变。^[19]

四、先秦两汉时期福建农业与周边地区的比较及原因分析

从上文可知,在距今 5000 年左右,福建的原始农业开始出现,在距今 3000 年的西周时期农业经济始占主导地位,表现为落后的刀耕火种生产形态,西汉早期仅在靠近内地的闽北和政治中心的福州才发展为锄耕和犁耕农业,其它地方仍为火耕水耨的经济生产形态,随着闽越国除,甚至这种农业经济形态被迫延滞,东汉时期仍出现地广人稀局面。相比之下,邻近地区的农业经济则一直发达。如浙江地区,在距今 6500 年的河姆渡文化,农业已成为主导经济,春秋时期发达的农业为吴、越两国的强大提供物质保障;江西地区,万年仙人洞的考古资料显示距今 12000 年左右原始农业便出现,而商代新干大洋洲和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铜石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锸、耒、耜、铲、铤、镰、镞反映了吴城方国农业的发达程度。同广东相比,先秦时期,闽、粤两地的农业发展大体一致,但是秦汉开始,土地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很快得到开发,番禺成为一个河港兼海港、商贾南来北往的大都会,汉武帝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较快地跟上全国的历史步伐。^[20]显然,福建的农业经济长时期处于落后局面。

什么原因导致福建的农业经济长时期的原始落后?笔者认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闽中富裕的采集狩猎族群,延缓了其农业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其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又阻碍了外来先进文化技术的传入,其农业和文化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正因如此,从而在秦汉时期,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差异,福建为中原统治者所鄙视,被视为边缘地带并遭废弃。

研究表明,^[21-22]在距今 8000 年~6000 年左右,为全新世高温期,福建地区的植被旺盛、海生和野生动物丰富。此时人们大多生活在海滨阶地,如壳蛭头、腊洲山、富国墩等,他们捕捞文蛤、牡蛎、蚬、海螺等贝类和海龟等海生动物,同时也在遗址附近的山林里狩猎各种鹿类或采集果实。丰富的天然资源使得当时的闽越人只要花较少的劳动便可得到充裕的食物,因此对植物的栽培自然没有压力和吸引力。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全球进入气候波动期,气候的波动会导致植被和对气候敏感的贝类和动物的减少,而早期富裕的采集狩猎使得人口增加,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加强对一些块根植物的培养与种植,但是昙石山等贝丘遗址的文化内涵说明当时居民仍有丰富的自然食物资源。距今 3000 年开始,全球高温期结束,气候转寒,加上早期居民对贝类的过度捕捞,贝类资源日益枯竭,在无法继续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主要食物来源的情况下,农业才开始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对块根植物、也对稻作进行种植和培养。进入两周时期,随着吴越文化的缓慢传入,其先进的稻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农业生产工具始入闽中,尤其在战国中晚期,随着越国的灭亡,越国贵族逃入福建并成立闽越国更有可能,闽越人的原始农业经济才得到初步的发展。秦时,秦始皇以兵威边,迫使闽越王去王号,闽中首次与中原发生接触,但由于秦王朝的迅速崩溃,中原汉人没进入福建,相应地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未能传入福建。而同时,两广接纳了至

少上百万中原汉人,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得两广的农业经济迅速超过福建。汉初,汉代铁器大量输入,福建的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福建的闽越政权主体为闽越族群,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自然无法与两广地区的汉人为主的南越政权相比,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开发自然也相当有限。福建大片的荒山和滩涂,对于需要开拓疆土、发展农业的汉人政权来讲并不适宜。而由于闽越与汉文化的差异,闽越悍,数反复,使得汉统治者认为“得之不可为郡县,福建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23](卷114)} 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土地平坦肥沃,汉人又多,文化差异不大,自然更适合西汉统治者。因此汉武帝在灭南越后,迅速广设郡县,派遣官吏和减免赋税,而灭闽越后,将其居民迁徙内地,放弃了对福建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闽越人原本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自然无法与内地和两广相比。六朝时期,江东立国,福建大后方的地位才显现,随着汉人的迁入和政府的重视,福建农业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进程,并逐渐赶上周边地区。

[参 考 文 献]

- [1] 吴春明. 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95, (2).
- [2] 福建省博物馆,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福建诏安考古调查简报[J]. 福建文博, 1987, (1).
- [3] 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平潭壳头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1, (7).
- [4] 林朝启. 福建金门富国墩贝冢遗址[J]. 考古人类学刊(台大), 1973, (33-34).
- [5] 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浦城牛鼻山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6, (2).
- [6] 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4, (4).
- [7]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 1965, (2).
- [8] 铁山中学, 等. 福建政和县发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J]. 考古, 1979, (6).
- [9] 福建省博物馆, 等. 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J]. 考古, 1985, (12).
- [10] 曾凡. 福建闽清永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考古[J], 1965, (2).
- [11] 栗建安. 福建云霄墓林山遗址发掘简报[J]. 东南文化, 1993, (3).
- [12]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考古, 1961, (5).
- [13] 庄锦清. 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J]. 考古, 1977, (3).
- [14] 杨琮. 武夷山闽越国故城出土的铁器研究[A]. 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 [15]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 [16] 杨琮. 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出土的铁农具[J]. 农业考古, 1990, (1).
- [17] 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18] 严助传[A]. 汉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9] 吴小平. 汉晋南朝时期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变迁[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0, (2).
- [2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博物馆. 广州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 [21] 吴春明. 对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J]. 考古与文物, 1996, (3).
- [22] 杨建明, 郑晓云. 福建沿岸 6000 年来的海平面波动[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1990, (4).
- [23] 东越列传[A]. 史记[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责任编辑: 陈少华]